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儒林外史》角色析论

科目编号：ULSZ 3078

学生姓名：陈欣情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方美富师

呈交日期：2013年11月1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	i
宣誓 .....	ii
摘要 .....	iii
致谢 .....	iv
<b>第一章 绪论</b> .....	<b>1</b>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地 .....	1
第二节 论文构思 .....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	4
第四节 研究难题 .....	8
<b>第二章 时代</b> .....	<b>9</b>
第一节 背景 .....	9
第二节 假托明代之因由 .....	12
<b>第三章 士人</b> .....	<b>14</b>
第一节 真儒 .....	14
第二节 迂儒 .....	19
第三节 坏儒 .....	25
第四节 名士 .....	28
<b>第四章 妇女</b> .....	<b>32</b>
第一节 独立自主的女性 .....	32

第二节 依附男性底下的女性·····	37
第三节 惨遭迫害的女性·····	40
第五章 其他·····	42
第一节 和尚·····	42
第二节 商人·····	46
第三节 百姓·····	49
第六章 结语·····	54
参考书目 ·····	57
一、专书·····	57
二、期刊论文·····	58

# 《儒林外史》角色析论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1 ALB 00813

日期：2013 年 11 月 15 日

## 摘要

吴敬梓出生在清初一个世家大族里。他从原本热衷于功名，到后来转变成科举制度的批判者，这其中与他个人坎坷的经历有关，导致了他思想上发生了两度的转变。《儒林外史》是吴敬梓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吴敬梓把小说的背景假托于明代，寄寓了自己的心事以及对制度的不满。《儒林外史》拥有非常独特的“连环套”结构，利于作者把当时代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罗列开来。通过对小说中的人物角色进行分类和整理，大致上可把角色分成三组，分别是士人、妇女和其他类。经过对社会群体分析后，我们得以从中窥探吴敬梓念兹在兹的那个“众人皆醉”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关键词：**《儒林外史》；吴敬梓；人物；时代

## 致谢

从 2013 年的 1 月起，我们就开始为写毕业论文而忙碌。从设定主题、拟定大纲、阅读资料到后来开始撰写初稿，然后再修改成定稿。这一步步走来，其实很艰辛，也很幸运有许多人陪伴在我身边，给我帮助和鼓励，让我能够勇往直前，完成这份论文。

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论文导师一方美富老师。撰写论文期间，每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迷思的时候，我就会马上通过电子邮箱与老师取得联系。老师总会以非常快的速度给予我回复，解答我的疑惑，或者为我提供新的方向。老师就是强大的后盾和资源库，总是提供给我非常好的意见，也帮助我开发了不少灵感。

再来就是要感谢我的家人。由于做论文期间，有数度到新纪元学院图书馆及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取经”。由于交通的不便利，每次都需要家人的载送。而且撰写论文期间，家人非常担心我的身体状况。明明很想打电话问问我的近况，可是却不敢因为怕打扰到我。而我总因为忙碌，也很少时间陪伴在他们身边。之后会多抽时间陪陪家人。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的。

最后要感谢同班同学。大家有难同党，有福同享，有什么关于论文的资料和信息都会互相分享。每次遇到什么问题，大家都会在一起讨论，并提供意见。有了并肩作战的好朋友，我们才可以在前进的路上走得更远，更快。

在此感恩身边所有人对我的指导、包容和关爱。谢谢。

# 第一章 绪论

《儒林外史》写成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前。作者吴敬梓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极尽讽刺之能事，把百余个角色玩弄于鼓掌间。通过一个个人物行列开来，我们可以从中深入的看到那时候人们的生活，以及在各种制度下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何。通过把小说中角色的分类，再以他们为社会中该群体的代表，并论述他们在当时代普遍的现象和概况。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地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人们从成化末年到万历四十四年的生活状态和面貌。小说虽以士人为主，但其他的人物却也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他们，我们得以一窥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态度。事实上，吴敬梓是要通过雕塑小说中所有的人物，来构筑出一个时代的大主角。关于这一点何满子学者也有说过：

儒林外史的最大意义上的价值就在于，它带着鲜明的倾向性“表现了那时代的一切特色的生活本身”。在它所表现的生活中，谁也不是全部生活的主角；可是那些人物，却分摊着作者赋予他们的任务，在自己身上表露了时代生活的某一个镜头，某一个色相，某一个调子；而当这些人物被纠集起来时，吴敬梓便塑造了一个巨大的主角：那个时代的、社会的本身的性格。（何子满，年月不详：72）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几乎囊括了社会阶级上中下层的人。他们各自代表着那

个时代的某个位置和角色，从而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那个时代。无论是小说中有名字的人物，仰或无名的一群邻居或围观者，都代表着那个时代。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带出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特性。

我们之所以可以这么论断，是因为《儒林外史》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小说人物都是典型性的、代表性的。它与史传文学不同。史传文学是倾向于对历史事件的陈述，而《儒林外史》是小说，通过作者的修饰和创作，它更能带出社会意义以及人心堕落的这一情况。这一点马茂元学者有说过：

“儒林外史”里任何一个人物性格的成长过程，都是发展的、变化的、互相影响的，而不是静止的，孤立的。从发展、变化、互相影响的过程中，显示出一种深刻的社会意义，因而它不是浮光掠影的现象罗列，而是典型的、本质的反映。

（马茂元，1959：269）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通过塑造典型的人物来带出当时社会的本质。因为人物就是反映社会最好的材料。《儒林外史》里的角色的关系网颇为复杂而庞大。我们可以这么说，《儒林外史》中的人人都是主角，但是最大的主角是人物所带出的那个时代和现象。

通过这些材料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想法和观念，更是那个时代所有有心的士大夫的想法。对《儒林外史》角色的分类及分析，能让我们从更细微处，把时代特色呈现出来。

## 第二节 论文构思

透过对《儒林外史》叙事结构的掌握，我们可以更清晰的了解小说中的各个情节以及各个人物在自己的位置上所扮演的角色。把小说中的角色代入到现实环境中，我们得以探究各个群体这个时代中的的情况。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儒林外史》的写实性其实相当高。吴敬梓以其讽刺的笔锋，部分的角色更是依据现实中的人物为蓝本，再刻画出一个个鲜明生动的角色。

童庆炳在《文学概论》中给予小说的定义就是：

小说是一种以人物形象的创造为中心的散文体的叙事性的文学样式。（童庆炳等，年月不详：255）

人物可以说是小说的灵魂。没有人物，小说就不成小说了。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小说都会有一个或以上的人物主导并贯穿整部小说，我们称之为主角。《儒林外史》全书五十五回，人物众多，但我们从小说中却找不到贯穿其中的主角。这是有赖于《儒林外史》独特的结构。

来自日本的学者中野美代子是这样解释的：

在“儒林外史”一书里从头到尾没有一贯的主角。A逸话里的主角系a，B逸话里的主角为b，彼此各有独自的阶段与变化……那就是在A逸话方面，虽然a为角色，但在偶然之间也会出现b，后来又脱离A的主题；同样的，在B的逸话里面亦是如此。ABCD……。各个逸话的连接，恰如锁环的缠绞情况。（中野美代子，

随着时间顺序一环接一环的发展小说，使情节随着不同的人物，在不同或同样的地点，开展不同的故事。易言之，就是《儒林外史》没有一个以人物为主的角色。人物存在于小说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物是最好反映人性和表达作者情感的媒介。但吴敬梓却更深一层的利用了小说中的人物。《儒林外史》呈现没有人物主角的状态，却以时代连贯而下，因为吴敬梓要做的，是要用很多的人物来带出他心目中最大的主角——那个时代和社会。故此通过对人物角色的讨论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代的社会状况。

我先针对作者的生平做出大致上的了解，明白作者思想的复杂性。之后再摸索明清之际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情况和氛围为何。之后再进入文本细读，对小说的叙事结构有大致上的掌握，再整理并归类《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基本上可分成士人、妇女、和尚、商人及百姓五类，基本涵盖了社会中的大部分角色。而每个分类里面又可根据他们的为人或态度再进行细分。接着再把群体中代表性的、典型的特色挑出再做分析。直言之，就是透过小说人物在小说中的活动，看出现实中人们如何在制度底下生活及他们的心理。但如果并未对人物做出分类的话，则会没有办法细致的呈现时代的特色。

###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是倍受瞩目的。尤其是对于《儒林外史》独特结构的研究及吴敬梓的讽刺艺术所作出的讨论。类似的研究非常多，且众说纷纭。

其中以鲁迅和胡适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胡适把《儒林外史》和《海上花列传》做出比较，认为《海上花列传》的结构远远胜过《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只是一串短篇故事，没有什么组织；《海上花》也是一串短篇故事，却有一个综合的组织。（胡适，1999：377）

胡适对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并未给好的评语，而是认为它缺乏鸟瞰的布局。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独把《儒林外史》归纳在讽刺小说的类别底下，并针对其结构提出：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鲁迅，2005：299）

比起胡适的评论，鲁迅的评论较为委婉。胡适与鲁迅的评论对于后世影响颇大。之后的学者提出的说法大致上也不脱二位的影子。

然而，也有其他的学者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并不松散，而是有一个主题统领全文。比较常见的说法有如吴组缃、何其芳等人提出的：

《儒林外史》从‘功名富贵’的问题着眼，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堕落和政治的黑暗与腐败。（齐裕焜、王子宽，2005：383）

但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完整。因为吴敬梓在小说中所表达的远比功名富贵还多。其他学者也有提出各种主题，尝试为《儒林外史》找出一个主干，但往往都无法很准确的表达出作者的意思，所以基本上都是各执一方。

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也是大家所津津乐道的。鲁迅评论道：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撻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2005：228）

鲁迅确实把吴敬梓的讽刺艺术诠释得很全面。在阅读《儒林外史》的时候，即使吴敬梓“无一贬词”（鲁迅，2005：231），但读者依然可以心领神会吴敬梓的嘲讽。也有学者尝试把悲剧和喜剧的元素结合讽刺艺术进行讨论。如宁宗一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儒林外史〉的实践》中提出：

悲剧因素同整个作品的戏剧性熔为一炉，统一于作者严肃的人生态度。（转引自齐裕焜、王子宽，2005：392）

这种说法也是相当的贴切的。《儒林外史》中人物诙谐的表现往往叫人哑然失笑，但背后所揭露的血淋淋的沉痛。90年代时，学者引进了西方的新理论对讽刺艺术进行研究。如安如峦《从互文性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以西方文

学研究的互文性理论来分析文本（齐裕焜、王子宽，2005：393）。此后也有不少学者尝试以西方理论来解剖《儒林外史》。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应回归到小说的中华文化的背景上，才能更好的诠释小说的文化蕴涵。

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角色的研究多是针对某群体或某人单独的研究，或对人物原型的考究。对于人物分类较为经典的有卧闲老人为《儒林外史》所写的序：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吴敬梓，2010：687）

卧闲老人通过人物对功名富贵追求的不同态度的而得出这个说法。另外，尚有马茂元先生把《儒林外史》里的人物分成两种类型，分别是：游泳在恶浊污秽的人生洪流里，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并依附他们的外围人物。另一种是不愿随波逐流，风流文采的名士高人（马茂元，1959：269）。与马茂元先生的分类大致相似的有李汉秋先生在《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的分类。他把儒生分成假儒、迂儒、真儒；把名士分成真假名士。但马茂元先生和李汉秋先生的分类里，并未纳入女性、市井百姓、商人及和尚等群体。

本文并没有依照上述的方式进行分类。因为卧闲老人是从功名富贵的观点出发，而本文则是从对时代的讨论出发的。而既然要对时代进行讨论，则不能遗漏了对女性、百姓、商人及和尚群体的关注和研究。

#### 第四节 研究难题

在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儒林外史》的人物非常多，加上“连环套”的结构，对于掌握整部小说是很混乱的。要做针对角色的论题更是要对各个角色的个性、特征、经历都非常熟悉才能把角色分析得透彻。另外，小说中的人物之间的交集也是相当的复杂。为了弄清楚人物之间的关系，我得花时间把人物的关系网画出，并对文本进行多次的阅读。

在参考资料方面，各家对于小说中不同的群体和人物都有自己的诠释和理解，甚至对吴敬梓的生平和思想都有各种分歧。所以我在进行研究的时候都会谨慎选择材料，并尽量回归原文去理解作者的意思，以避免曲解作者之意。

再来，由于研究课题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比如说在处理对妇女的部分就需要去翻阅对当时代对女性地位的研究、处理和尚的部分则需要参考佛教史之类的书籍。所以需要同时掌握好几种群体的概况，有时候会造成思绪上的混乱。对于这种情形，我选择先完成某个群体的所有内容再继续处理下个群体的问题。这样就能避免资料交错所产生的混乱。

## 第二章 时代

研究《儒林外史》必定要关注吴敬梓的生平经历所造成他思想上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的导致了吴敬梓走上批判科举制度的道路。另外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的背景假托于明代的因素。这样方能理清《儒林外史》中的时代是那里一个时代。

### 第一节 背景

《儒林外史》乃吴敬梓一生的大作。书中有不少他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投射，寄寓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和经历。吴敬梓一生经过两个重大的思想转折点，使他从一个宦宦世家、热衷功名的人，转变成一个叛逆、抨击科举的人。

据程晋芳所作的〈文木先生传〉记载：

先生姓吴氏，讳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显者，先生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稍长，补学官弟子员。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吴敬梓，2011：565）

吴敬梓出身与望族，而且天资聪颖，长大后的吴敬梓更是慷慨豪迈。吴敬梓自小生活在宦宦世家，并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成长。吴敬梓起先是热衷于功名的。他不仅参加多次考举人的乡试，而且为讨得主考官的恩赐，甚至不惜侮辱自己

的人格，向试官“匍匐乞收”（周中明，1982：68）。可见吴敬梓并不是一开始就鄙夷功名和科举的。

在吴敬梓 24 岁的时候，他父亲吴霖去世。吴霖去世前因做官为人刚正，却被罢官，最后郁郁而终。这件事对吴敬梓的思想造成冲击。吴敬梓的堂兄吴槃为祝吴敬梓生日的时候曾作〈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写道：

弟也跳荡纨绔习，权衡什一不谙……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

弟也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虬……（吴敬梓，2011：318）

吴敬梓在父亲去世后，家族曾发生财产争夺的事件。对于自己家族人的欺辱和贪婪叫吴敬梓心寒，同时点燃了吴敬梓叛逆的导火线了。吴敬梓有公子哥儿的纨绔，加上性格豪爽，以至于家产都被变卖了，家族势力更是消逝了。这点与《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角色是符合的。吴敬梓在家道中落后的生活，深深体会身边的人的势利，及上层社会对人民的压迫。而这些元素都融入进小说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多次名落孙山。这已经深深打击了他的信心和澎湃的热血，并开始对功名发出质疑。这是吴敬梓思想上的第一次转变。

此后的吴敬梓陷入面对功名态度的思想斗争中。直到乾隆元年，吴敬梓三十六岁，安徽巡抚赵国麟先生到全椒举荐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但吴

敬梓并未前往参加考试<sup>1</sup>。他从此“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贫”（吴敬梓，2011：565）。这一个转折段对吴敬梓而言是很关键的。中野美代子认为，吴敬梓因为故意放弃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之后懊悔不已，所以以一位反对体制的脱俗之士的心情写出“儒林外史”，终身当然不得不贫困潦倒了（中野美代子，1977：70）。中野美代子剖析吴敬梓，认为他是因为自己几度与功名错身而过，因此“恼羞成怒”，转到了对立面，与科举抗衡起来了。这是吴敬梓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变。从全椒移居到南京后，吴敬梓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不断下滑直到断炊的状况。所以吴敬梓很能体会下层人民的苦衷和困难，为他著《儒林外史》提供了素材。

经历了两度的转折，吴敬梓的思想趋向稳定了。但吴敬梓的思想是复杂的。他的思想里面既有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清初顾炎武、颜元等进步思潮的浸润，还有魏晋风度的影响（转引自齐裕焜、王子宽，2005：383）。吴敬梓是忠于儒家思想的，所以《儒林外史》中才会安排盛大的泰伯祭。吴敬梓能超越儒家思想而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那是源自于顾炎武“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顾炎武，2006：946）的思想。《儒林外史》里风度翩翩的名士，是受魏晋风度影响的痕迹。这几种思想在吴敬梓的身体里碰撞、磨擦、融合，形成了《儒林外史》独特的思想特色。而这些思想特色的形成与吴敬梓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吴敬梓个人在这个时代的生活并不顺利。他遭遇丧父、家道中落、财产争

---

<sup>1</sup>对于吴敬梓为何没有参与博学鸿词科存疑。大体有两种说法。一为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所说的“安徽巡抚赵公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吴敬梓，2011：565）。”程晋芳认为吴敬梓是因为不屑入仕而没去考试。《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化身—杜少卿在吴敬梓的笔下也是如此做。但胡适以唐时琳的序中提到“两月后，敏轩病愈，至余斋……余察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吴敬梓，2011：589）”证明那时候吴敬梓是真的有病在身而错过了这次的机会。

夺、科举失败等等的遭遇。因此他对这个时代、对科举制度、对人性有很多的不满。吴敬梓把他一肚子的牢骚和感慨寄寓在已经过去的时代，并通过讽刺的方式写进《儒林外史》。在讽刺的过程中，吴敬梓是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使们跟着醒觉并意识到这个病态的社会和制度。

## 第二节 假托明代之因由

《儒林外史》涉及两个朝代，分别是小说中的时代以及吴敬梓的时代。

《儒林外史》第一回楔子以元朝末开始，第二回开始就从成化末年新年讲到第五十五回的万历四十四年，年份跨度大约从1447到1620年。根据胡适《吴敬梓年谱》：吴敬梓出生在康熙四十年（1701），去世于乾隆十九年（1754），享年54岁（吴敬梓，2011：581-605）。吴敬梓生活的这段时期正值“康乾盛世”。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采用假托手法，托古以说今。假托手法的运用能够假借其朝代岁月，同时穿插描写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显示了作者褒贬爱憎的倾向，表现了作者对所托时代历史过程的某些认识（杜贵晨，2000：100）。吴敬梓以明代为背景，而实际上，他所要描写的，反映的，表达的都是针对清代。这里就可以延伸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吴敬梓要选择托于明代，而不是其他的朝代？

最主要的原因是，吴敬梓希望通过以明亡的历史来警戒清朝的人民。吴敬梓生活在清初，与明亡距离并不远。Arthur Pollard在《何谓讽刺》一书中说道：

他（讽刺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使听众相信他所做的是值得的，或甚且是必要的。他必须言之有物，或至少也得使他的读者相信他言之有物。（Authur Pollard, 1973: 114）

为了能说服读者他的观点，吴敬梓采用了与当时代最靠近的一个亡国经验，以便能让大家认为他是言之有物的。吴敬梓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写《儒林外史》，无非就是为了提醒当时代的读者去关注科举制度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人们对于明亡的事件印象还很深刻。而且明清之际，不少制度和文化并不会相差太远。所以当时代的人读起来会更加的感同身受，更能体会制度的危害性。

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官员们贪污和腐败是其中一点。由于科举制度对文人思想的钳制，以至于他们无法发挥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只是功名富贵底下的傀儡而已。正如顾炎武所说的：

时文之出，每科一变……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顾炎武，1983：23）

从《儒林外史》中士人的部分，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人是能够真正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真儒们虽然有着高尚的品德，但却不问政事；迂儒们更是不用说，即便中举当官了，但是思想和才学却是空洞的；坏儒们眼前只有利益，更不会为百姓谋取福利；名士们一肚子牢骚，徒增社会中的寄生虫而已。当国家陷入危难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主持大局了。清朝正延续着明朝的科举制度。吴敬梓对这种局面的担忧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但由于文字狱的限制，吴敬梓只能通过托古于明朝，希望籍着明朝的兴亡史，唤醒清朝统治者及士人。

## 第三章 士人

吴敬梓通过描绘《儒林外史》中士人扭曲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继而揭露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弊病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残害。有的人在功名富贵面前丝毫不低头、有的人则以科举为终身信仰和追求、有的唯利是图，在功名富贵面前忘乎所以、有的人沽名钓誉以逃避自己成为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的事实。吴敬梓曾是一个功名的追求者，到后来变成一个名士，他深深体会这个社会 and 制度对于士人所带来的影响和扭曲，继而走上批判科举制度的道路。吴敬梓于是把士人的众生态描绘出来，揭露出科举底下士人的哀歌。

### 第一节 真儒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除了刻画士人丑陋一面以外，也在小说中寄寓了吴敬梓对文人最高理想，也就是那些对维护和完善儒家精神不遗余力，且真正符合文人典范的人物。《儒林外史》中堪称真儒的有王冕、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和虞博士。从他们的身上也可以看出吴敬梓对文人的要求。

楔子具有点起全文的作用。在《儒林外史》第一回的楔子里，吴敬梓就以王冕的故事来统领全书的文人。王冕可说是是吴敬梓的乌托邦—理想中的文人的化身。王冕读书是自觉的，他把天文、地理、经史的学问都贯通，而不是像时下的文人只专注做八股，读朱注。王冕读书不为功名，也不好交朋友，生平只有一个却是一辈子最要好的朋友就是秦老，总在他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对比后文的二娄，即便结交满天下，最后却只落得个意兴阑珊。王冕为人嵌崎磊

落，有自己的原则，不因为对方的权势而妥协。王冕那种有真才实学、藐视权贵、不入仕的精神是吴敬梓所向往的。王冕不入仕除了是个性上的因素以外，也是因为他把科举制度及其弊病看得透彻。王冕更一语道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话。不似后文其他诸生，是为了求名、或者应试失败，继而通过伪装成不屑入仕的态度来掩饰自己是个科举制度下的失败者。

杜少卿被认为是作者在小说中的化身，是作者在小说中的投射。对于有困难的朋友，杜少卿都会倾尽全力的帮助他们。杜少卿身边聚集了一群垂涎于他的财产的人，少卿的大方使他成为大家敲诈的好对象。他的慷慨，除了是吴敬梓自身的写照外，也是要歌颂他对金钱鄙夷的态度。此外，杜少卿对结交权贵是很不屑的。盐商设的宴会、王知县的邀请他通通都拒绝。倒是王知县落难的时候，杜少卿反而伸出援手借予房子住。杜少卿接待四方客人与二娄的情况略又不同。二娄是因为无法登科一肚子的牢骚，通过结交朋友树立名士风范。杜少卿则不然，只是单纯的豪杰和不羁而已。杜少卿对功名嗤之以鼻。不仅自己不应考，也不喜欢别人应考。巡抚李大人举荐了杜少卿去征辟时，杜少卿装病，躲着不去。这一点与小说原型人物的实际情形有所不同。这是吴敬梓想要提高杜少卿的思想高度而写，同时给自己错过博学鸿词科一个完美的借口。杜少卿的思想也很前卫。他对妻子的尊重和对纳妾不以为然的看法是值得敬佩的。可见吴敬梓本身也属于时代中少数对女性地位表示同情的人。

迟衡山也是《儒林外史》的真儒之一。迟衡山乃泰伯祭的主催人。他对礼乐崩坏的情况感到痛心。他更是一语说出了当时代读书人堕落的情况：

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吴敬梓，2010：415）

迟衡山要办泰伯祠的意义是很用心良苦的。他希望透过为吴泰伯立祠，挽救当时士大夫颓靡的状态。迟衡山的这份理想和心意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虽然他不是泰伯祭的主祭，但他可是一手包办所有泰伯祭的事情的人。如果说虞博士作为主祭，拥有绝高的品德的话，那兴办泰伯祠的迟衡山，拥有对士人命运极大的关心和担忧。迟衡山是儒家精神忠实的守护者，有时难免有些墨守成规。比如说在众人商讨着要邀请戏子钱麻子一起来玩的时候，迟衡山就问：“老先生同士大夫宴会，那梨园中人也可以许他一席同坐的么？”（吴敬梓，2010：420）。迟衡山还抱持着儒家那套认为戏子的地位很底下，所以不宜一席同桌约会的观念。虽然吴敬梓这样写迟衡山，并未见吴敬梓对他有批评之意，而且钱麻子原本就不是什么值得敬重的角色。除此之外，迟衡山特别痛恨术士，主张丧葬时只需选择地下干暖，无风无蚁的地方就好，那些动辄就说“这地可发鼎甲，可出状元。”（吴敬梓，2010：544）的都是哄人的。就这点而言，可说是迟衡山思想上比较前卫的部分。

当然我们不能遗漏了庄绍光。他是《儒林外史》中的第二真儒。庄绍光名满天下，却不为所动，也不乱结交朋友。庄绍光应召入宫时，面对娘子的疑惑，庄绍光如此解释道：

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做不得的。（吴敬梓，2010：427）

庄绍光的立场很清楚。他对于当官并不热衷，但这并不表示他是在隐逸。所以同样都是征辟，杜少卿是很激烈的反应，做了生平难得一件伪装的事情来逃避作官；庄绍光则是选择听天由命的去朝见皇帝了。在谒见皇帝前，庄绍光参与皇帝升殿的仪式。吴敬梓把庄绍光入宫时宫廷的环境和仪式都做了细致的描写。但，在这样金碧辉煌，极大的排场当中，庄绍光只是一个参与的角色，他并没有特别的欣喜若狂，也并没有因为皇帝准许他在宫中骑马而觉得骄傲。这是庄绍光的修养和本性所致，也是他与牛浦郎、匡超人之辈的差别。自此之后，达官贵人、本地乡绅各个都来拜望叫庄绍光日日忙得不可开交，庄绍光恼怒，于是搬到皇帝恩赐的元武湖中住，过上“神仙”似的生活。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未看到庄绍光的大喜大悲或者任何的执着，他总是缓和而平稳的。他这种淡漠功名的态度是作者所赞赏的。

虞博士乃《儒林外史》中第一真儒，泰伯祭的主祭。吴敬梓在小说中另外替他立传，不像其他诸儒登场只是由一个人过渡到另一个人，足见吴敬梓对他的重视。虞博士知足安分，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是其他儒生所不及的，也是作者所艳羡和赞颂的。虞博士在报录人告知中举后，只是平静的当衣服打发他们。虞博士的平静和范进、周进之辈欣喜若狂，发疯痛哭的执着形成极大的对比。虞博士的品行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对于自己所作的好事都很不以为然，认为挂在嘴边的就不是好事了，也从不要人称赞他。虞博士对朋友的帮助与杜少卿对朋友的帮助在性情上略有不同。虞博士是平静而低调的；杜少卿是慷慨激

昂而无节制的。此外，虞博士的心眼是明亮的。有人在他面前道是非的时候，他是清醒的能辨是非，而不是像汤知县之辈，被人稍微怂恿就完全忘乎所以的人。虽然虞博士和杜少卿都在真儒之列，但两人其实性格迥异：虞博士是敦厚的，而杜少卿是带着叛逆的心理的。但两人还是结为好朋友，互相欣赏。

从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所写的真儒，我们可以归纳成几点，是吴敬梓对文人要求的准则。首先就是孝顺。在《儒林外史》中不难发现吴敬梓对孝悌的强调。从堕落前的匡超人、王冕、庄绍光、杜少卿等人，吴敬梓都不吝嗇笔墨去写他们对父母或长辈敬重，毕恭毕敬的伺候着。小说中的豪杰，对于急需钱来安葬父母的人（如杨裁缝，跳河被虞博士救起的庄农等人），他们总是对孝行赞不绝口，并落力的帮助。

接下来是真儒们对功名不执着的态度。在科举制度下，众文人只有一条荣身之路，个个踏破门槛只为功名富贵。如范进、周进、马二之辈，早已读书读得浑浑噩噩，眼里只有考取功名以外没有其他物了。真儒们已经看透了科举制度的本质，加上他们普遍都有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所以并不执着于此。

真儒们有自己的原则。他们不畏惧权贵，对于高官、盐商，总是不屑于他们为伍。即使见着达官贵人，他们也不会哈腰奉承，而是以自己一贯的姿态来应对之。对于朋友，他们肝胆相照。真儒们都有自己的真才实学。他们不是只会“读死书”考功名的文人。他们也不像杭州的名士那样，因为考取不到功名，只好每日写诗引以为雅，借此推广自己的名声，但是实际上却是莫有通的。真儒们有着自己的才气，广读诗书，丰富自己的见识。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是真儒们对社会伦理的担忧。他们不是隐士。他们不是把自己置放在一个深山荒野中，对世事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居于闹市，对世事关心，但并不感染市井之气。吴敬梓笔下的真儒，都是当时代的士人的学习典范。他们身上具有当时代士人所缺乏的精神、思想和品德。而他们所欠缺的这些，恰恰好是因为科举制度的钳制和功名富贵的枷锁，导致他们心眼的闭塞和盲目。真儒们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态度，所以可以脱颖而出，成为吴敬梓笔下的真儒。

## 第二节 迂儒

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长达 1300 年，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制度中历时最久、变化最小而影响最大的一种制度（刘海峰，1996：3）。自明清开始，科举制度发展达到最高峰。对于科举制度历来有褒有贬。实际上科举制度的本意是好的。正如威尔·杜兰所说的，科举制度是：

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威尔·杜兰，1998：544）

科举制度打破了自汉代出现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让普通百姓也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但科举制度的发展到后来变成极大的束缚、钳制读书

人的思想。这个制度的缺点是人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威尔·杜兰，1998：546）。事实上从明代起，不少学者官员已经意识到科举制度的弊病，并对此展开讨论。科举制度几度废兴。但狭隘的阶级利益，使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消极的因素（王道成，1988：128）。官员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科举制度才会一直无法进步，直至残害文人，乃至整个社会。吴敬梓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意识。所以在《儒林外史》中迂儒的行列里，吴敬梓通过这些人物迂腐的表现来讽刺科举制度对文人思想的残害。

科举制度的出现，是平民百姓能够脱离目前的社会地位，一跃变成“老爷”、“举人”的地位的唯一的方式和路径。要知道，文人可是要经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才能当上进士。因此众人前仆后继，只为出人头地的一天。对于不幸无法一次中举的文人，生活窘迫不堪，为众人讥笑，真叫人同情不已。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六十多岁了，却还是个“小友”，每日青菜豆腐，在薛家集教书，只是为了讨口饭吃。吴敬梓在刻画周进最着力的部分莫过于周进撞号板哭得满地打滚的那段情节。吴敬梓把寒士苦读数十载，却郁郁不得志，一事无成的苦闷和委屈都表现了出来。这与《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后发疯的举动的意义是一样的。像周进、范进这样的儒生，又何止一个？他们就像被人抽走了一半的灵魂，考科举已经考到他们的心灵麻木不堪了。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所谓的荣辱廉耻了。在他们被人耻笑和奚落的时候，也只是一丝的脸红和窘迫，已经不知道难过和耻辱的感觉了。这也值得人们反思，把科举当作人生唯一的追求是否值得？从周进阅卷的方式，我们也大致上可以知道考官是怎样遴选秀才的。考生并不是有真才实学就一定能够中举。相反的，很多时候还要靠一点运气。比如范进和魏好古的水平其实并不高，但周进还是让他们

通过考试。这种方式不禁让人怀疑制度的公正性。虽然周进对功名的追求有些过度，但事实上周进本身还是有良心的。周进自己吃苦过了，会心想不要屈了真才，在阅卷上可以说是用心用意的。

科举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考试的内容。清代文人考科举以八股文为主。八股文有一定的格式。作八股文要“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说作者必须把自己作为圣贤的代言人（王道成，1988：89）。作者不得有自己的想法，一切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这种情况造成文人们“束书不观”，对四书五经以外的事务浑然不知。这一点，吴敬梓早已安排王冕在楔子中道破：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吴敬梓，2010：13）

小说中的人物，如鲁编修教导女儿鲁小姐时，把八股文章捧到顶点，以至于鲁小姐对于其他的诗词歌赋都不正眼看它。如周学道教训魏好古：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吴敬梓，2010：35）

周学道再三的、苦口婆心的劝告魏好古，以八股文为正务，以诗词歌赋为杂览。这种观念已经深深置入文人的脑海里，所以他们除了八股文那点东西以外，其

他所有事务一概不知。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可见一斑，如范进之不知苏轼、马二之不识李清照等等，他们的无知其实就是社会文化的悲哀。

除了学术上的无知以外，有的文人在生活中也是非常的无知。如周进在没有馆坐之后，没有收入，却也不会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是等着坐吃山空。除了周进以外，吴敬梓也把范进窝囊、呆滞的形象刻画得异常生动。尤其范进卖鸡的画面，范进那种彷徨无措的模样叫人觉得可怜又可笑。范进在生活中根本就是一个生活白痴，家里的事情都由年老的母亲和妻子打理，自己则不断的考试，落得让一家三口都挨饿。周进和范进两人，大概除了考科举以外，什么事情都不会了。范进是一个遵守那流于表面形式的儒家规矩。如范进母亲去世后，汤知县宴请。宴会前范进退退进进的模样的，让人又换杯盏，换筷子的，好像为母亲守孝很笃敬。但美食当前，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在嘴里”（吴敬梓，2010：57）。范进表面上那套实际上也只是做给别人看而已，内心是否因为母亲的去世而难过，也就不得而知了。

马二先生是典型的“久病成医”。考过多次科举却未曾中过，只能以编选本系以为生，同时籍此扬名。马二先生对八股文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看法，说起这些是侃侃而谈的。就像八股文这种僵化的文体，恐怕没有给马二先生带来更多的进步，反而被囚锢在陈腐的道理中。马二先生极度遵从《四书》《五经》中的道理。鲁迅先生说道：

为著者挚友，其言真率，又尚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在……（鲁迅，2005：230）

你看他的思想和八股文一样死板和不懂的变化。马二先生的世界里，所有的事情都只为科举，不再有其他因素了。但事实上，八股文只是当时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一块“敲门砖”罢了（王道成，1988：92）。挤身进入进士之列后就不再需要用到。马二先生的想法其实是直接的影响了当时代广大考生的思考方式。所以可以知道其中的危害有多大。

要说迂腐的儒生，怎么能够少了王玉辉——一个鼓励自己的孩子殉夫的父亲。在王玉辉的女婿去世后，悲痛不已的女儿提出要殉夫。王玉辉作为父亲，认为这是一件青史留名的事，非但不阻拦，反而大加鼓励。在老母亲在为女儿的去世伤心难过时，王玉辉说：

“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吴敬梓，2010：588）

每当读到此处不禁毛骨悚然。这是多可怕的一种思维模式。女儿特意寻死以追随夫婿，只为得到一个“好题目”来死。一个贞洁烈女的名号就可以赔上一条性命。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在王玉辉身上。因为殉夫的想法是由女儿自己提出的。

王玉辉在女儿去世后也是很悲痛，常常思念起自己的女儿。他不是没有亲情的冷血动物。促使王玉辉和女儿做出这种决定的，是那吃人的礼教。他们俩对礼教的依从已经凌驾在亲情和性命之上了。吴敬梓正是要通过王玉辉女儿的死亡来反省礼教所造成的扭曲的心理。树立贞洁牌坊的仪式看似辉煌伟大，但实际上这种精神面貌是空洞而麻木的。

吴敬梓在描写鲍家父子帮向知府在察院里监考时，通过鲍文卿之眼，带出文人的丑态：

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到了抢粉汤、包子的时候，大家推成一团，跌成一块，鲍廷奎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眼前，把上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被鲍廷奎看见，要采他过来见太爷。鲍文卿拦住道：“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上来，把那洞补好，把那个童生送进号去。（吴敬梓，2010：323）

诸文人为了进一个学，丑态百出。如此的行为是吴敬梓所不屑的，连戏子鲍文卿也都看不起。迂腐的而盲目的科举追求者，之所以用尽一生的努力，牺牲自己的尊严也要考科举，最终的目地不过就是功名富贵而已。吴敬梓在小说的第一回开头就点明：

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吴敬梓，2010：1）

这句话说的恰恰好就是迂儒这一类的人。作者吴敬梓对于他们是同情的。科举制度作为唯一的荣身之途，它给予寒士扬名立万的机会和希望，却也造就了文人盲目的追求。而及其束缚文人思想的考试制度，更是产生了一群笃信儒学，但不懂得变通，思想闭塞，继而变得迂腐而浑噩的迂儒。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重要的一层，他们的僵化将会延续并一直影响到整个社会，从而社会的发展停滞不前。

### 第三节 坏儒

其实汉语里并无“坏儒”这一词。这里的坏儒的意思是指那些精神已经被现实社会制度所压迫继而变型的人。他们读着圣贤书，但他们的品格却已经完全变型，脱离了道德伦理。我们不禁要思考，科举制度所考的四书五经，到底对士人阶层有什么帮助？陈腐的道理一翻再翻，早已腐朽不堪，加上僵化的作文方式，士人根本无法从书中学习到什么。对他们而言，只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一个作用而已。

“张周府里的老爷”这似乎是胡屠户在教训范进的时候常说的，两人可说是胡屠户的偶像，是书中乡绅的代表。他们有一定的财力和势力，是百姓眼中所艳羡而惧怕的对象。张静斋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贪官。张静斋初识范进的时候就已经是又送银子送房子的，俨然是个大好人，两人还以兄弟相称。但事实

上在范进中举前，张静斋却不曾到来馈赠。张静斋是那种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地而不择手段的人，从他叫佃户闹事以从僧官慧敏骗取土地的行为就可看出。范进母亲去世后，范进费用不敷，张静斋于是带着他到高要县找汤知县打秋风，其实也是趁机为自己找好处。在禁牛肉的事件中，张静斋建议汤知县处罚老师夫，不是因为秉公办理，只是为了借此出一个名。可见张静斋草菅人命及其想法的卑劣。妙在是汤知县居然听从张静斋，由此可知官员的水准。

还有一群儒生，他们都是贪图利益之徒，如二王和严贡生。严贡生可以说是上流社会的流氓。他总是说的比做的好听。“与汤父母相与”“为人率真”“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等等，没有一件事是真的。严贡生作为一个贡生，不仅不为百姓服务，反而压榨百姓，以自己的势力来博取好处。从王小二家的猪到黄梦统的借据再到吃云片糕的船家，都可看到严贡生一副市井无赖的样子。但无奈的是他们乡绅人家势力庞大，故此大家都惧怕他们。除了严贡生以外，还有王德王仁，二王兄弟俨如严监生的军师，总是及时为严监生提供帮助。但他们的帮助都是建立在对他们有利益的前提下才帮的。严监生的妾赵氏一直以来都努力的笼络二王，给他们不少好处。但一旦他们发现从赵氏身上没有利益可取时，他们也不再帮助她了。严贡生也是如此，利益前后的模样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叫人心寒。

荀玫的母亲去世后，荀玫要去呈丁忧。王惠居然阻止他，叫他迟些才报。一旦呈了丁忧，儒生得在家三年后才能应考。王惠的意思是趁早把考试考了，再来报。这几乎把荀玫陷入不仁不义不孝的境地。蘧景玉在交接父亲的公事予王惠的时候，就通过“戡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吴敬梓，2010：106），完美的呈现一个贪官污吏的做事行为。妙在王惠居然没听懂那是讽刺他的话。王

惠上任后把百姓打得魂飞魄散。但这样的一个官员居然能被评为“江西第一能员”，可见科举制度下所出的官员的水准。再来是宁王叛乱之时，王惠弃城逃走，然后很没有立场的就马上归顺了。这就是《四书》《五经》教育出来的人物。之后宁王失败后，王惠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捕，于是改名换姓削发为僧去了。十多年过去了，在郭孝子坚信万苦的找回王惠时，王惠无情的打死不认儿子，怕是自己东窗事发吧。王惠就是一个熟练八股文和四书五经的人。但在做官后却并未奉行其中的道理。可见科举教育的失败。

匡超人是《儒林外史》里不断堕落的角色。吴敬梓通过匡超人的堕落，显示出环境对一个人的改变是多么的重要。匡超人最初登场的时候，完全没有透露出他变质的信息。反而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孝子。匡超人的气质秉性也不像其他的儒生，除了读书以外什么都不会，匡孝子还是能够放下身段，学习做生意，料理家务也是井井有条的。匡太公知子莫如父，所交代的遗言莫不一一应验了。从匡超人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匡超人一开始遇到马二先生，就以举业为重。遇到景兰江等人，“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认同了以名士扬名的做法。结识了潘三老爷，眼见潘三阔气的模样，让匡超人心理艳羡不已。自此匡超人认同了潘三老爷为非作歹的行为。匡超人在旁协助着，同时捞取好处。除了说是身边的人的因素以外，匡超人本身也是一个没有主见和立场的人，才会这样一路被牵着走。匡超人入太学后，更是势利，事事讲求排场，要匡大“凡事立起体统”来。同时又爱夸大其词，事实上却连“先儒”是什么都不知道，足见科举底下的教育产物的水平。匡超人的改变可以说是社会环境所导致的。可见那时候社会上充斥着这些人，不知带坏了多少个匡超人。

牛浦郎的角色和匡超人的角色其实是两两相对的。他们都是被知县发掘，并且都是二度娶妻。牛浦郎在寺庙读书的时候极其用功。但原本就手脚不干净的牛浦郎还是重操旧业，偷了老和尚房里牛布衣的诗集。从牛布衣的诗集中，牛浦郎发现，原来只要会作诗，并不需要进学考试，也可以与大老爷们相来往。于是牛浦郎就占用了牛布衣的名字和诗集。牛浦郎也是忘恩负义之徒。对于提供过他帮助的人，他都不曾抱有感恩的心，反而接二连三的要恶整他们。

吴敬梓刻画这些人物的时候心情恐怕是痛心的。这些人的存在于上流社会中。他们原本在社会中应该是扮演为国为民的角色。但在利益、权势面前，他们通通底下了头，道德、伦理、是非不再成为他们判断事务的标准了。他们就像是身体里的一颗恶性肿瘤，对于国家的前进是一种危害，。

#### 第四节 名士

科举制度底下，催生了一群独特的群体，就是名士。明清之际，不少应考失败的士人，不甘从此错过功名富贵，于是以名士自居。他们多以诗文著称，籍此提高自己的名望。但名士当中，更多的是寄生虫之辈。每一公众事件都是仪式般的行为；知识分子籍此与朋辈欢聚，而更重要的是，籍此博取声誉（林顺夫著，胡锦涛，1984：129）。他们专门结交达官贵人，并从他们身上获得利益，同时为自己求得名声。他们往往与结交名人为傲。鲁编修在小说中说得好：“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吴敬梓，2010：130）。假名士们确实是如此。

《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安排以二娄为中心聚拢一群假名士假侠客。二娄因无法早年中鼎甲，入翰林而闷了一肚子的牢骚。常常酒酣耳热的时候就在那里发牢骚，批评朝政的不是。他们企图借着自己庞大的家势，有意模仿战国时期的四君子养士的举动。但无奈，两人才学不足，也不会辨识人，把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等牛鬼蛇神都能被奉做宰相府的上宾。尽管如此，二娄心地也不坏，而且对人也很尊重。看二娄与邹吉甫的互动即可知道二娄并不是喜好摆架子的公子，相反的是很和蔼很随和。面对挤河路时打船只的仆人，二娄也并没有很生气，相反的只是好言相劝。二娄对待朋友也是肝胆相照的。二娄虽然品性上差了些，但名士风味还是有的。他们两人到处游山玩水，寻觅高人的时候还是很优雅的。但是由二娄承办的游莺脰湖大会，聚集的皆是迂腐的人。看似雅集，但实际上却像是一场闹剧。

假名士中有一些是属于寄生虫类。杨执中和权勿用两人的情况基本相似，他们都是不会种田又不会做生意，以致坐吃山空。他们都是招之即来的，以便及时捞取好处。杨执中老年中举，权勿用更是连复试都没有通过。杨执中俗称“老阿呆”，因为发表批评朝政的言论，正好击中二娄的心事，继而被二娄认为是高士，请到家里来。杨执中平日呆里呆气，但遇着关键时刻却又不呆。权勿用脸皮最厚，一句“我和你至交相爱，分甚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吴敬梓，2010：157）。就可知道此人的品性如何。杨执中和权勿用居住在娄府中，除了吃吃喝喝讲闲话以外，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贡献的。从他们身上更是完全看不出名士的气质。

还有一类名士，最爱附庸风雅，如景兰江、赵雪斋之辈。他们嘴上挂着不屑考科举，但实际上内心里还是对功名耿耿于怀的。景兰江开头巾店，却爱看

书，爱作诗。在初遇匡超人时，就急于表现自己以及与自己相互来往的对象，希望籍此抬高自己的身份。事实上景兰江的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没通过科举而留有一个遗憾。这可从他时时把名士和进士做比较的言谈就可看出，景兰江想通过当名士来安慰自己失败的悲哀。景兰江等人平日聚集的时候总爱分韵作诗，却又不爱写诗。这一点吴敬梓通过匡超人之口带出：

及看那卫先生、随先生的诗，“且夫”、“尝谓”都写在内，其余也就是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吴敬梓，2010：237）

因为八股文要求作者“代圣贤立言”，所以常用“且夫”、“尝谓”等词于起讲的部分。名士所作的诗已经失去了诗歌的抒情性和美感了，完全脱离诗的范畴了。但景兰江自我感觉良好，以赵雪斋为例，认为当名士比当进士享名更多。景兰江确实有名，不过，是有名的傻子。

《儒林外史》中还有一种名士属于真名士，如杜慎卿。杜慎卿温文尔雅，气度就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不同。杜慎卿与附庸风雅类的名士不同。杜慎卿有一定的才学和深度，初次见面就评点萧金铉的诗，把他说得透身冰凉。杜慎卿的傲慢与招之则来，挥之即去的杨执中之辈就是不同。景兰江等人聚会的时候总爱分韵作诗，但这对杜慎卿而言是“雅得这样俗”（吴敬梓，2010：362）的这么一回事。杜慎卿对“开口就是纱帽”的宗先生表示厌恶，也厌烦那些来要求题字的人，但不能免俗的，他还是欢喜郭铁笔对他的奉承，喜欢排场。杜慎卿被季苇萧作弄而去寻找传说中的美少年着实是件浪漫而又即雅的事情。杜慎

卿有一定的家底和才学及名士的性格。以至于他在小说中呈现了与其他假名士不同的气息。他有个性，懂得享受，是典型的上流社会公子。对比其他假名士，寒酸气顿生。但对于杜慎卿而言，不是什么钱他都舍得花的。像对鲍廷玺一类的人，杜慎卿则把他一干二净的推给杜少卿。

士人是中国社会中重要的结构。当士人士人也陷入迷茫、颓靡、麻痹的阿Q精神时，谁来为社会贡献？我们不禁要反思，当时代泛滥的名士，俨然已经成为社会的负担和寄生虫，阻碍国家的进步。

## 第四章 妇女

《儒林外史》中，妇女多是充当陪衬的角色，通过她们来看出男人的性格或与男人做出比较。我把小说中的妇女分成三类，分别是独立自主的女性、依附男性底下的女性以及遭受迫害的女性。通过这三类女性角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对女性的看法及女性的地位。

### 第一节 独立自主的女性

吴敬梓生活在清代。这个时候的文人思想被八股文所钳制，被《四书》《五经》等所束缚。但事实上却有一部分人的思想已经开始进化。虽然妇女在清代的生活还是相当的凄惨，但是也已经有人意识到女权的问题：

清代对于女性之摧残已经到了极度了，但也竟出了几个同情女性的人……  
但同情女性最大主张最透辟的要算后来的李汝珍和俞正燮。（陈东原，1973，246-247）

李汝珍出现比吴敬梓稍晚。从李汝珍的《镜花缘》中所表现的才女开科取士，对学术体制化和功利化的否定，可见文人的头脑也并没有完全被八股文所束缚着（商伟，2012：3）。李汝珍和吴敬梓不约而同的都有对女性问题表示同情，并赋予女性一定的定位。吴敬梓在写《儒林外史》的时候就已经有赋予妇女一

定的角色和个性，拥有智慧、才情和义气。尽管如此，吴敬梓的这种思考尚处于启蒙阶段，从《儒林外史》中只能略略看到一些苗头而已。

我把沈琼枝和胡氏归纳在独立自主的女性。把胡氏纳入此类虽然有点勉强，但能与沈琼枝做出更好的比较。胡氏多次嫁娶，为人嚣张，见识较多，但有个性。胡氏对自己的要求十分清楚，要“他又要是个官，又要有钱，又要人物齐整，又要上无公婆，下无小叔、姑子。”（吴敬梓，2010：329），但只听沈大脚之言并未自己去查继而导致自己后来疯疯癫癫的。为什么不能把胡氏确切的归类在独立自主的女性呢？那是因为胡氏多翻的嫁娶，其实始终还是想要依靠男性来获得稳定而安逸的生活。她提出的嫁娶条件都是为了要过上好的生活。这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人该有的表现。

沈琼枝是小说中少数真正拥有进步思想，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的女性。沈琼枝从宋家逃到南京卖文。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灵活的应变机智。独来独往，一切都是主动的……这种新女性的出现尽管在典型性格的塑造上，还不够十分成熟，但是是特别值得令人注意的（马茂元，1959：273）。这里带出一个关键词就是“主动”。相比起小说中其他的女性，沈琼枝之所以独立是因为她主动。在知道自己被欺骗后，她不愿意认命，而是勇敢的逃离盐商家。她选择靠自己过活，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来挣钱养活自己。所以沈琼枝是小说中唯一独立自主的女性，这就是她与胡氏的差别。

胡氏与沈琼枝她们共同的地方在于，尽管离开男人生活，但都没有人敢惹他们。比如在第二十六回中，沈天孚说胡氏：

就为这胡七喇子的名声，没有人敢惹他。（吴敬梓，2010：328-329）

胡氏之所以没人敢惹在于她的泼辣劲，而且有一定的智慧懂得保护自己。而沈琼枝更是厉害，连狐假虎威的差人以及地痞流氓也拿她没辙：

两个差人倒有些让他。（吴敬梓，2010：512）

差人没奈何。（吴敬梓，2010：512）

地方上几个辣子想来拿囫头，却无实迹，倒被他骂了一场。（吴敬梓，2010：510）

沈琼枝的立场很坚定，也勇于反抗，所以也不容易被欺负。倒是有钱有势的盐商才是让沈琼枝烦恼和忧虑的。

吴敬梓对于沈琼枝这类女性我想态度的是承认的，敬佩的。沈琼枝是小说里唯一一个女性的角色不是陪衬，而是情节的主要人物。吴敬梓写沈琼枝的侠气和豪迈，借此批判和讥笑其他小家子气的伪儒。沈琼枝是有胆色的，敢与官差、地痞无赖抗衡，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被他们唬倒，着实的勇敢的，对比起小说中的其他男儿，如严监生：

严致和见差人来说此事，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见哥哥又不在家，不敢轻慢。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忙打发小斯去请两位舅爷来商议。

（吴敬梓，2010：64）

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见差人就紧张兮兮的，毕恭毕敬的，生怕做错些什么。为了怕惹麻烦，严二还甘愿自己出钱帮助严监生收拾残局。这与无财无势的沈琼枝形成极大的对比。

从小说中，见沈琼枝被人多番误会，就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的地位还是很底下的。武书说她：

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却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吴敬梓，2010：506）

迟衡山说：

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吴敬梓，2010：509）

可见一般的儒生都是很看不起沈琼枝的。但杜少卿——一个被大家认定为是作者在小说中的化身的人物，虽然一开始并没有理会沈琼枝，但到后来听说沈琼枝被恶少捣乱，倒也说“此时多失忆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难而来此地？我正要去问

他。”（吴敬梓，2010：509），足见吴敬梓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怀。尽管生活很困难，但沈琼枝依然努力的生活，刺绣得到女人们的赞赏，诗文才情却连男儿也都折服。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多番嫁娶的胡氏，吴敬梓并未有批评之词。根据《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的记载：

中国向来是只有贞节的问题没有贞操的问题的……（陈东原，1973：242）

寡妇多难再嫁第一自然是因为她没有处女的童贞之故，其次便是说她命中犯了披麻星……（陈东原，1973：245）

一般来说寡妇要再嫁是很困难的。身边的人也会鄙视她和她的家人。但在《儒林外史》里却不是这么一个情形。小说中的胡氏在审判的时候，县老爷居然很开通的说：

你也是嫁过了两个丈夫的了，还守甚么节？看这光景，儿子也不能和你一处同住，不如叫他分个产业给你，另在一处。你守着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当下处断出来，他另分几间房子在胭脂巷住。（吴敬梓，2010：328）

县老爷想法开通，也不吝给胡氏一条生路。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吴敬梓针对胡氏多翻嫁娶的歧视和批评。顶多只是批评胡氏的为人和作风。可见吴敬梓对于妇女守节的问题思想还是比较开通的。

## 第二节 依附男性底下的女性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清代时期，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为何。英国使者访中后表示：

中国的妇女，尤其是下级社会妇女，她们只有一个伦理，那就是无条件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绝对服从是她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除此而外，再无其他是非准则（斯当东，1994：426）。

这与中国社会传统观念是联系的：

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汉]公羊寿，1999：581）。

在当时，女性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外乎就是女儿、妻子和母亲。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样恳恳切切的女性。这类依附与男性底下的女性，

大多数没有自己的名字，仅以姓氏出现在小说当中。这其中包括各种角色，如母亲、妻子和妾。

女性从扮演女儿的角色开始。父亲可以决定孩子的一切，包括嫁给什么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和观念。如王玉辉的女儿接受了来自父亲陈腐的礼教观念、鲁小姐接受了来自鲁编修的读书观念。鲁小姐是少数有机会受教育的女性，有别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特点。但吴敬梓写鲁小姐的才学，主要是写鲁编修和鲁小姐之俗，而不是真的要表扬鲁小姐的才学。尽管鲁小姐俗气，但料理起家务来还是井井有条的。

结婚后，女性要听从丈夫的话之余还要与小妾周旋、争风吃醋。站在妻子的位子上，有的女性过得很凄惨，有的则过得很幸福，视乎自己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杨执中对又痴又聋的妻子拳打脚踢，正如天二评说的“此姬只作女仆用”（吴敬梓，2010：147），丝毫没有尊重和爱怜。再来鲁编修因女婿不举业，一时生气说要娶妾生儿子，丝毫不考虑妻子的感受。而夫妻感情要好的有杜少卿夫妇和庄征君夫妇。杜少卿的妻子默默陪伴在杜少卿身边，杜少卿有事也会与杜娘商讨，虽然她没什么主意和主见，但是一路与杜少卿携手走过，感情十分要好。杜少卿也不纳妾，终日带着妻子游山玩水好不快活。庄征君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很要好。两人在湖上的生活，享受湖光三色。杜氏夫妇与庄氏夫妇可谓《儒林外史》中的模范夫妻。

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女性角色是妾。对于纳妾，杜少卿是不愿做的，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事。

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吴敬梓，2010：425）

杜少卿作为公认的吴敬梓的化身，表达了对纳妾的想法，一个人如果纳一个妾将导致天下一个男人没有妻子。除非是四十岁尚无子嗣才可纳妾。如果妾生不到儿子，就让她另嫁。虽然这个观点还是以男性的利益出发和考量，但已经有反对纳妾，尊重原配的想法了。

女性在当了母亲之后，对儿子的有多方顾虑和担忧。吴敬梓往往安排老母亲们在儿子有所成就的时候去世。比如荀玫的母亲也是在荀玫中举后，以为可以靠着荀玫教书过日子，不久就去世了。又比如范进的母亲，在儿子发迹了，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一句“这些都是我的了！”（吴敬梓，2010：45）就高兴得病了，继而去世。可怜女人辛苦一辈子以为等到享福的时候却撒手离开人世。

小说楔子中，王冕的母亲虽为寡妇，但有为儿子做打算。王冕也孝顺。母亲临终前对王冕的交代，以不入仕为自己的遗言。知子莫如母，知道自己儿子的个性如此不羁，为保儿子性命，甘愿儿子平凡的生活下去。而且王冕母亲也看得透彻，尽管周围的人都以做官为荣，只有她看出做官的都不会有什么好收场。母亲对儿子总是忧心的，挂心的，多少年也不变化。比如匡超人母亲“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得极厚的棉袄，方缠放下心”（吴敬梓，2010：204）。一个动作，把母亲慈爱与关怀的表现显露无疑。

这一大类的女性在男性和礼教的约束下生活。她们无法冲破“三从”“四德”的枷锁。她们背负着这些由礼教所施加的压力走过这一生。但事实上，这些观念的延续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男性，而是来自母亲。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把“三从”“四德”的观念教予自己的孩子，孩子长大后又是如此这般的教育自己的孩子。男性则扮演着鼓励的角色。这就导致了这种观念恒常不变的在社会中流传，深入每个人的心中。故此女性的地位一直无法提升就是这个原因。

### 第三节 惨遭迫害的女性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好几个女性被迫害的事件。从她们所遭受的事情来看，我们不仅可以体会礼教吃人的可怕，及那时候女性地位的低微。

小说中侍女荷花被一群光棍在茅家铺被轮奸。县太爷只是“每个光棍打十几个板子就放了。”（吴敬梓，2010：241）。由此可见女性地位之低，并不受到重视。而，吴敬梓的行文中也并未对此表示同情，只是略略带过此事以发展潘三的情节而已。

《儒林外史》中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角色就是赵新娘。赵新娘的情况有点特殊。她最直接的迫害者是严大，其他隔岸观火的则包括赵老二、赵老汉、家丁等人。但其实把赵氏陷入困境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就是赵氏缺乏独立的精神。赵氏有着鲜明的个性又懂得谋略，但她的计谋只是为了更好的依附在“三从”的对象上，也就是丈夫和孩子。出身不好的赵氏自知赵老二、赵老汉靠不住，所以才会拉拢二王和严大，来代替兄长的位置。又因为儿子夭折，赵氏才会急于立嗣，这一立嗣才引狼入室，导致了自己窘境。赵氏的野心其实没

有很大，只是想要当上正室，名正言顺的享受当下安逸的生活及财产地位。她之所以不独立在于她一味的只想着靠别人，而从来没有想过要靠自己去过上好的生活。只有到最后众叛亲离的时候，才隔着屏风哭哭啼啼的为自己争取，确实又可怜。

王玉辉的女儿在丈夫去世后，会从儒家孝悌的角度去考量父亲和公婆的困难，继而殉夫。王玉辉女儿的去世虽然是她自己的决定，但事实上这是为礼教的观念所害。她认为活在世上增加父亲和公婆的经济负担是为不孝，但难道让疼爱她的母亲、公婆看着女儿一步步走向死亡，让他们伤心难过，就是一种孝吗？但，对于王玉辉女儿和王玉辉，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殉夫以获得响亮的名节，得到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在礼教吃人的面前，王玉辉的鼓励，使女儿觉得自己的表现是理所当然的，坦然的，丝毫没有质疑和退缩之意。她的勇敢无畏，正是被礼教冲昏头脑的表现。

从这群被迫害的女性当中我们得以看到妇女在当时的生活状况是非常的可怜的。她们不仅在社会中的地位低下，甚至为礼教所杀。对妇女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迫，对于男性而言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些压迫很多时候是建立在病态的礼教上。最可怕的是对妇女思想上的洗脑，她们并未觉得这些制度和看法是不公平，相反的，她们也默认了自己的低下地位。

## 第五章 其他

《儒林外史》中还有另一些群体，他们地位低下，生活与社会底层。他们有的因此重利、奉承，有的洁身自好，品行比士大夫还要好。他们是社会底层人民的缩影。他们的影子遍布全书，最能代表时代的特性和社会文化。吴敬梓以他极其挑剔讽刺的笔锋把群体中不为人知丑陋的部分都挑了出来。

### 第一节 和尚

《儒林外史》中虽以文人为主，但和尚的角色却可在小说中处处见得，几乎遍布整部小说。这是因为和尚与文人关系的密切。佛教在清代的发展还算蓬勃，基本上沿袭明代的制度。而吴敬梓生存的那个年代更可以说是清代佛教的全盛时期：

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尽力振兴儒教；对于佛教，亦颇提倡。清代所护喇嘛教，皆黄衣派，而称本国固有之佛教徒为青衣派。然顺治、雍正二帝之参禅；乾隆帝之翻译经典；则与固有之佛教，关系至深。可谓清代佛教之全盛时期。嘉庆以后，国势凌替，佛教亦随之衰颓。（蒋维乔，2007：234）

清代皇帝虽然并未压制佛教的发展，但对佛教的制度却多加管制。如设立僧官制度、不许私自创建寺观庵院、要申请度牒否则不许任意出家等等制度。这些

制度的出现主要也是朝廷要管制出家人的数量，因为僧道没有户籍，可以免税。长期下去朝廷的收入会受影响。

吴敬梓笔下的和尚与传统认知里的和尚非常不同。《儒林外史》中出现的和尚就有吃酒肉的僧官、因贫穷而私自出家的和尚、势利眼的和尚、多情的和尚等等，千姿百态，完全颠覆我们往常对于和尚的认知。吴敬梓反映出一向庄严神圣宗教的另一面。

和尚需要守戒律。而《儒林外史》中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僧官慧敏。慧敏并不是一个遵守戒律的和尚，而是一听佃户何美之说有酒有肉就垂涎三尺，屁颠屁颠跟着去。摆出来的母鸡、火腿、酒都吃得香香的，还脱了一件衣服腆着肚子，十足就是一个酒肉和尚的范儿。从僧官慧敏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身为一个宗教人员该有的端庄和自律精神。Arthur Pollard 在《何谓讽刺》一书中提出讽刺家以四种方式把讽刺意义呈现出来，第一种就是“以一个人所做(或不能做)的事 (Arthur Pollard, 1973:36)”。吴敬梓带出僧官慧敏的这个角色就是要揭露僧官的所作所为来批评和讽刺僧官制度的弊病。再来与牛浦郎聊天的和尚，违背了多嘴的戒律，犯了“我说与你，你却不可说出来”（吴敬梓，2010：287）的毛病。根据清代朝廷对佛教管制的严格程度来看，和尚违反戒律的事情应该比吴敬梓描写的少。吴敬梓之所以这样写恐怕也是讽刺家的个性作怂。

寺庙道观往往得到朝廷的支助，所以一般上设备齐全，而且环境安静舒适。所以会有不少读书人都会在寺庙读书准备考试。可以说文人与与寺庙主持、和尚等等的关系也颇为密切，同时思想上也深受禅佛的影响，环境的优美恬静对

文人在文学上的创作也是有一番建树。在《儒林外史》中可以看到很多文人在无处可去的时候都会寄宿在寺庙，由和尚打点一切。和尚与文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有的结成性命之交，有的宛如主仆，而小说中出现的关系以后者为多，以凸显文人的为人。如小说第二回中，薛家集众人道和尚庵里商讨闹龙灯事宜，庵里的和尚招待着吃茶，还要被申祥甫发作，责备和尚把荀老爷捐的油“白白给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吴敬梓，2010：18）。和尚毕恭毕敬的伺候着，又是喂驴又是做饭。再来，景兰江一席人借不到地方喝酒也是到和尚家里去。胡三先生等人买了物品也都是交予和尚收拾。庵里的和尚仿佛就为服务一众文人而出现。

纵观《儒林外史》全篇，最慈悲的和尚莫过于甘露庵的老和尚。老和尚见牛布衣孤寡，经常与他作伴。牛布衣去世后，老和尚悲恸不已的帮忙料理后事。老和尚时时为牛布衣上香洒泪，可真是一个多情的和尚。之后牛浦郎出现，老和尚见他读书用功，还借于他地方看书。老和尚的义气和多情是许多人都比不上的。对比其其他狼心狗肺的文人有过之而不及。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往往把和尚想象成超越凡人的境界。但实际上和尚也只是普通人，大部分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是会有恐惧的。比如恶和尚报复老和尚的时候，老和尚吓得直哆嗦的样子，就知道他还没把生死超之度外。

吴敬梓讽刺和尚最多的部分莫过于部分和尚们的势利眼。他们口中叨念着钱财好处，奉承高官、商人，自然像仆人一样毕恭毕敬的伺候着。如腾和尚听说要请他做揽头，马上的就“屁滚尿流，慌忙烧茶，下面。”（吴敬梓，2010：50）。又如匡超人一家失火后要投宿到庄南头大路的一个和尚庵。和尚以：“本村失了火，凡被烧的都没有房子住，一个个搬到我这庵里时，再盖两进屋

也住不下。况且你又有个病人，哪里方便呢？”（吴敬梓，2010：211）拒绝了。但潘保正开腔，并说由他来付香钱，和尚才无可奈何的答应。恐怕也是畏惧潘保正的势力和看在香钱的份上才答应的。之后，匡超人中举，潘保正帮他在庵里摆酒贺学，和尚却也来奉承一番。吴敬梓揭露出和尚贪婪的面目。就在季恬逸等三人寻地方选文章，第一个询问的老和尚要价三两一月。诸葛天申已是出二两四了，和尚还是不答应，还一直骂骂咧咧借小和尚撒气。这类和尚在吴敬梓笔下不再与助人为本，不再清心寡欲，不再修行念经，而是像个出租清静地的服务生，事事以钱财利益为前提。吴敬梓在描写一个场景的时候有时候会很顺手的带过一笔，把和尚也凑热闹，奉承的嘴脸带出。如匡超人中举后，和尚也来奉承。显而易见的，和尚在环境的影响下已经沦丧了他们该有的慈悲和宽阔的胸怀，而是处处以金钱利益为重了。

还有一种和尚，我们称之为假和尚。他们也许为了避难，为了避债而自己削发为僧。但骨子里并没有要当一个和尚，只是借和尚这个名位的方便来捞取利益。如向知县审判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为活杀父命事”。和尚为了骗取牛只，而在光头上撒盐让牛淌出泪水，再说是自己的父亲叫人施舍然后转卖出去。当然少不了降顺了宁王的王惠，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捕，于是削发披缁，躲到深山里去了。还有陈和甫的儿子陈和尚也是，自行剃度，换了一顶帽子就是和尚了，为的只是逃避家庭的责任而已。

僧人在社会中扮演宗教师的角色。但在《儒林外史》却极少的描述他们诚心诚意的供佛的情形，更多是刻画他们的贪婪、势利和狡诈。《儒林外史》中，和尚群体和文人群体有相近的地方。和尚和文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理所应当要扮演的角色。他们纷纷都在功名富贵底下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吴敬梓在小说中极

大的讽刺和批评他们的行为。和尚享有免赋税的福利。但和尚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反而越来越多人涌到佛祖前面求庇护。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朝廷和社会的负担。

## 第二节 商人

商人在《儒林外史》中也扮演着很特别的角色。他们有的商人不会经商却爱好读书作诗，有的是精打细算的守财奴，有的是为朋友两肋插到的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阶级是最低下的。但是，社会机构越复杂，本质与现况就越颠倒，财富多少也能左右权利的运用（中野美代子，1977：44）。比如说朝廷有捐官制度，商人可以透过钱财来获得名声地位。只要腰缠万贯，任何势力都不需要担心。商人这一群体的情况很特殊。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商人总是自觉这一点。但许多附庸风雅的文人，没有官位，也不会打理生意，就会依附在这些大财主的身上来获取利益。财主们也希望借助这些文人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

在《儒林外史》里，也有善良的商人。如搭救牛浦郎的黄客人。即使牛浦郎生痢疾，黄客人也不肯放弃他。到了安东还给他买衣服鞋子的，对他及其照顾。与金有余同行的商人们在周进撞号板后说“论这事只该怪我们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为什么带他出来做这样的事？”（吴敬梓，2010：33）。可见商人们很自觉商人地位的卑贱。但是他们的谈吐里，“君子成人之美”“见义不为，是为无勇”，这些话顺手拈来，而且讲出来是做得到的。吴敬梓也是

借助这些商人的行迹来讽刺文人。文人常常只会说，但实际上却做不到，成了极大的对比。

这群商人也很阔达：

若中了做官，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就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走江湖的人哪里不破掉几两银子？（吴敬梓，2010：33）

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帮助一个人考科举是一件值得的事情。但这对于胡屠户可就不同了：

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交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吴敬梓，2010：38）

胡屠户认为是丢到水里去的。胡屠户与金有余等人两两相映，是极大的对比。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要似乎商人本身的个性和修养。

一旦商人有一点能攀附的关系时候，就会什么事情都想立起体统来，要叫人奉承。胡屠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商人地位的低下，所以一旦中举后就会很强调这些“体统”。一方面强调自己的地位不同了，却又不愿意借钱予范进考试。着实是个没远见的商人。另，商人也有些奇怪的方式来炫富。如万雪斋待客时：

奉过酒，头一碗上的冬虫夏草（吴敬梓，2010：289）

黄评说得好：“吃新奇药，用新奇茶，盐商恶俗。”（吴敬梓，2010：289）冬虫夏草是药草，却被当成菜来吃。除了炫富以外没有其他因素了。

虽然商人地位低，但是一些盐商或者财主却是连官员都敬个三分，都来奉承。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承（吴敬梓，2010：117）。只要是盐务都会让着，官员不想得罪商人。此外，商人也是文人的经济来源。如牛浦郎和牛玉圃多很奉承万雪斋，一旦失去这个依靠立马就捉襟见肘，赶紧寻下一个财主了。

有好些士人在落难的时候或者本业就是一个商人。他们多不会打理生意，但爱好看书和结交朋友。如杨执中，虽为商人，却不会打理生意。杨执中以名士自居，散发着阿呆气。又如匡超人一开始也是靠磨豆子卖豆腐和猪肉奉养双亲。景兰江与匡超人初遇的时候是手不释卷，看书看得认真的。他开头巾店，平日喜欢游山玩水，作诗，有不紧张生意。因作诗把本钱都用光了。折了本钱，只好借作诗为名到处找人借钱。

戏子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下的。但《儒林外史》中的戏子鲍文卿，却被吴敬梓描写成一个拥有高尚人格的戏子。卧评：“今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吴敬梓，2010：309）。鲍文卿爱才、不贪婪、自谦，这种种都与士大夫阶级的贪婪昏庸和自傲形成极大对比。鲍文卿也懂得爱才，为向知县求情。鲍文卿也不贪财，只为见偶像一面。对自己的

身份地位很有自觉，谦卑。向知县感谢他给五百两银子给他，他也不收。过继来的鲍廷玺，文卿认为他是正经人家，也不让他学戏，而是让他读书。倪老爹去世后，鲍廷玺也是帮忙料理后事，还让儿子披麻戴孝。鲍文卿之不贪。在搭船的时候，有两个安庆府的书办，要贿赂鲍文卿向太爷求情。鲍文卿自觉自己下贱，没有资格说情。也自认自己穷命，要自己努力赚的钱才好。坚决不做瞒老太爷的事。

从《儒林外史》中可看出，商人地位的提高。他们不再是士人所唾弃的一个群体。相反的，是文人所乐于依附的大财主。商人通过金钱可以买到官爵但是文人钱的话就做不到。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

### 第三节 百姓

《儒林外史》里还有一些小角色。虽然戏份不重，但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时代的信息和吴敬梓的思想。这些小人物位于社会的底层，默默的付出。有的是老实人，有的不甘于平凡，有的被上层社会压榨等等。

老实如秦老和邹吉甫在吴敬梓笔下是着实的可爱。秦老在楔子中与王冕的互动，就好象王冕的父亲一样照看着他。正如吴敬梓在小说中对秦老的描写——“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吴敬梓，2010：5）。卧评点评到：

秦老是极有情的人，却不读书，不做官，而不害其为正人君子。作者于此感慨不少。（吴敬梓，2010：15）

此话说得一点也不差。楔子中王冕与秦老的品行可以说是吴敬梓的乌托邦。吴敬梓走过一段贫穷的市井生活，对于普通百姓也有的势利必然感慨。邹吉甫感恩娄三娄四，为人“真诚恳挚”（吴敬梓，2010：117）。虽然只是看管娄家的坟墓，一个普通的百姓。但他与家人一来一往的互动却是温馨的，带出普通百姓家生活的状况。邹吉甫也是一个很贴心的人。他也很贴心知道杨执中没什么钱来招待二娄，所以自己准备了菜、肉、酒，十分体贴和周到。

接下来就是被官差、文人和商人压榨的平民百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官差的气焰和嚣张。如假冒娄三租米的船，家丁们用鞭子鞭打挤河路的船只，态度嚣张。又如权勿用前往娄府的时候撞到官员的轿子，官员一下子就把权勿用用链子锁起来。其他还有来报喜的、报信的门斗，总要占几分钱的便宜撵肯离开。官差们恃着自己的后合作威作福，为难百姓，克扣银两的情况在此可见一斑。易言之，百姓的生活其实不仅贫困，有受到官府的欺压。

在外国人的眼里，百姓的低下甚至已经没有了尊严：

中国老百姓的地位已经低到无可再低，即使被打一顿板子，他们也并不感到什么耻辱。（刘潞，2007：129）

被打板子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百姓的问题，往往能够被上层社会的人用钱收买和解决或者通过官府的裁判和压制来让他们妥协。而百姓也不再追究，慢慢形成百姓的地位非常低微。比如小说中有名无赖一严贡生。王小二被严贡生压榨、欺负，打断了人家哥哥的腿。黄梦统没有借到钱却要还严贡生利息。俩人告上

官府吵吵闹闹的，但是严监生的两个舅舅出钱补助医药费、还猪和契约，问题就轻松解决。百姓也不再去追讨所谓的公道和对处罚。渐渐的，所有不平的事情都可以用金钱来解决。

《儒林外史》中还有一群“群众演员”。他们没有名字，他们分布在小说的各个部分，他们的存在也是十分重要的让我们了解到各种信息。

周先慎评论道：

如果说胡屠户是作者着力描写的重点，那么，那些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众邻居就是面上的托和渲染了。这些在这幕讽刺剧中跑龙套的角色，作者对他们出场的安排，独具匠心。比如故事的前半段，范进中举前，他们一个也未露面……喜报那天确很多人出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周先慎，2004：259）

确实小说中很多忙忙碌碌的人物，即使没有提及他们的姓什名谁，可是他们却是鲜活的活跃在小说中，为小说增色不少。除此之外，他们也反映了很多有趣的现象，表现世态炎凉等等人性的丑恶。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人中举前后的对比。如周进中举后“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吴敬梓，2010：34）。而吴敬梓写得最肉麻刻骨，就是范进中举后的举动。邻居们忙成一团，款待官差、照顾疯掉的范进，找胡屠户、找范进弄丢的鞋子等等，套用黄评的话“忙刹邻居，干卿何事？”（吴敬梓，2010：40）。从邻居们的这些改变，吴敬梓要表达的是趋炎附势者不只是存在于上层社会，就连基层人民也都是这般势利。但值得

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比如说小说中牛布衣去世后，帮忙和尚料理后事却是各方邻居。和尚买酒菜款待邻居表示感谢的时候，众人道：“我们都是烟火邻居，遇着这样大事，理该效劳。却又还破费老师父，不当人子。我们众人心里都不安，老师父怎的反说这话？”（吴敬梓：2010：259）所以可见不是所有，只是大部分而已。

小说的最后，在泰伯祠和南京名士已经退出时代的时候，吴敬梓刻画了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四位市井奇人：

迨南京名士渐已销磨，先贤祠亦荒废；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一为“会写字的”，一为“卖火纸筒子的”，一为“开茶馆的”，一为“做裁缝的”。末一尤恬淡，居三山街，曰荆元，能弹琴赋诗，缝纫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间亦访其同人。（鲁迅，2005：232）

泰伯礼之后，随着名士们的离开，泰伯祠逐渐被大家所遗忘。建泰伯祠原本的意义就是要帮助政教。但最后也落得个一片凋零。吴敬梓通过市井四人来结束一部《儒林外史》，显示了他对士人阶层的失望，从而转向市井阶层有新的高品德人士可以取而代之，为社会带来一股新的气象。四人有着高尚的品格和不羁的性格。四奇人各自有着自己的谋生能力和才艺，与前文除了只会读书什么都不会的儒生形成对比。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如季遐年不愿跟着前人的步伐来写字，而是自由自在的发挥。这暗讽着科举制度下，大家只会照本宣课，跟着格式做的情况。

通过对基层人民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吴敬梓的眼光是遍布整个社会阶层的。甚至对于基层也带有一定的期望。在吴敬梓的理想里，基层人民应是像秦老和四奇人一样的朴实而又不拘于权贵。这样的社会风气是吴敬梓所向往的。吴敬梓对势利的群众描写得惟妙惟肖，却也让我们看出，功名富贵的影响遍布士人阶级到基层人民。

## 第六章 结语

吴敬梓的生活经历，造成他的思想百花齐放，融入了各家的思想。虽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度和礼教百般的讽刺，但实际上他却没有找到另一种方式来取而代之。马茂元先生认为：

吴敬梓既看到社会制度的丑陋和不满，但又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它，因而他自身也没看到人生真正的出路。这种微妙而复杂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儒林外史》的基本思想内容。（马茂元，年月不详，270）

吴敬梓以讽刺家的姿态，对许多事物表达了他的不满。吴敬梓只是完成了对制度和社会风气的批判，却还没完成真正把这些事物摈弃的做法。无奈之下，吴敬梓把希望寄托在真儒和市井奇人身上。

Arthur Pollard 说道：

讽刺家不关心事物的本身，而是关心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当人们的态度变得失却常态，讽刺家便起而纠正之。（Arthur Pollard, 1973: 32）

吴敬梓通过自己的经验，看出士人对待读书的态度，已经从学习的心态转换成对功名富贵追求的道路。士人因此变得麻木、闭塞、迂腐。吴敬梓对这种状况

觉得不满，也很担忧。于是就有《儒林外史》一书，把众人扭曲的嘴脸一一记录下，以期望获得人们的反思。

《儒林外史》除了其写实性及讽刺性以外，我们不能忘却他的反思性和忧患意识。吴敬梓对当时社会十分忧虑。那是吴敬梓的危机感。《儒林外史》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质疑就是在这个与时变迁的多重视角的展示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商伟，2012：7）。小说中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带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让人们自己去反省对于礼教和道德规范的一些问题。

通过对《儒林外史》中三大群体的分析后，我们略微可以勾勒出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及个性。吴敬梓所刻画的时代是充满着势利的、迂腐的、颓靡的，但其中也不乏可敬的、可爱的元素。士人阶层因为科举制度，他们的思想高度和品德已经是摇摇欲坠。其中尚能保持品德的真儒却已不多已。妇女背负着礼教的枷锁，无法挣脱，但吴敬梓对于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已经有较为进步和开阔的思想。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为财富而变得越来越高，和尚却因为金钱而变得越来越低下。他们是功名富贵下心理扭曲的另一个群体。而广大百姓和群众，虽然势利，但吴敬梓对于他们还是寄予厚望的。从整体上去审视这个朝代，会发现它所呈现的性格，其实与吴敬梓的经历也是十分相似的。吴敬梓经历对功名富贵追求，也被势利的人所伤害，为地方乡绅的欺辱，最后更走上了名士的道路。他的经历都在小说中有所投射。

本论文已经理清了《儒林外史》中各个群体和角色所带出的社会意义及吴敬梓对于他们的想法，并带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对于《儒林外史》的研究不应再停留在对叙事结构、讽刺手法、人物角色等等的方面了。未来对于《儒林外

史》的研究可往西方理论的方面发展，但切记要回到中华文化的背景下去讨论，以避免错解作者的原意及文化蕴含。

## 参考书目

### 一、专书

1. Arthur Pollard(1973): 《何谓讽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2. 陈东原（1973），《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3. [汉]公羊寿（1999），《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2006），《日知录集释》（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清]顾炎武（1983），《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6. 何子满（不详），《论儒林外史》，香港：宏智书店。
7. 胡适（1999）：《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8. 蒋维乔（2007），《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9. 刘海峰（1996），《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0. [英]刘潞、吴芳思编译（2007），《帝国掠影—英国使团画家笔下的中国》，香港：中华书局。
11. 刘裕焜、王子宽（2005）：《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2. 鲁迅（2005）：〈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3. 马茂元（1959）：〈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香港：古典文学出版社。

14. 商伟（2012）：《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5.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1994），《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香港：三联书店。
16. 童庆炳、梁仲华、锺子翱（不详），《文学概论》（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7. 王道成（1988），《科举史话》，北京：中华书局。
18. [美]威尔·杜兰（1998），《世界文明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19. [清]吴敬梓（201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 [清]吴敬梓（2011）：《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1. [日]中野美代子（1977），《从中国小说看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台北：成文出版社。
22. 周先慎（2004），《古典小说鉴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二、期刊论文

23. 杜贵晨（2000），〈《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24. 林顺夫著、胡锦涛译（1984），〈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述结构〉，《中外文学》，1982年12月1日第十三卷第七期。
25. 周中明（1982），〈应该全面地认识吴敬梓的思想转变〉，《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04期。